

贵州钱币

2016年第1期
(总第17期)
主 管：中国人民银行
贵阳中心支行
主 办：贵州省钱币学会
编辑出版：《贵州钱币》
编辑部
副主编：郝曙光
编 辑：闵培忠 靳斯慰
校 对：刘 华
地 址：贵阳市富源中路
318号人民银行
贵阳中心支行2楼
邮 编：550002
电 话：0851-83921722
Email: liu3921722@qq.com
刊头题字：黄锡全
2016年7月出版
印刷：贵州富华印刷有限公司

贵州钱币

贵州历史上的贝币及贝饰·····刘 力 解 飞	2
贵阳人的准货币	
——加盖“贵阳”字样的节约建国储蓄券·····黄成栋	7

专题研究

潞州交子印版考·····田秋平	9
-----------------	---

钱币文化

钱币上的“福”文化·····叶真铭	17
-------------------	----

地方货币

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书香人家	32
---------------------------	----

泉界动态

中国钱币学会2015年工作总结·····	35
中国钱币学会2016年工作要点·····	42



目录



贵州历史上的贝币及贝饰

刘力 解飞

在我国远古时期，大约在4000——5000年前的原始社会，因为生产力低下，物质极不丰富，所以一个部落或者一个家庭，还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用来交换其他急需的用品，部落或家庭之间偶尔发生的交换活动也只是以物易物，当时根本没有货币也不需要货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物质财富也相对丰富了，人们物质生活中的需求不断的扩大，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了，于是人们便把贝壳作为交换的中介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不知金属为何物的原始社会，贝壳是最珍贵的物质了。

贝是生长于热带、亚热带浅海的贝类，它小巧玲珑，色彩鲜艳，坚固耐用而成为原始居民喜爱的一种饰品。由于它有大小适中、便于携带、便于计数等特点，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社会的形成，贝作为交换的媒介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于是天然贝就逐渐充当了商品交

换的一般等价物。贝币的计量单位是“朋”，“朋”的古义是指一串或两串相连的“贝”，后来逐渐演化成计量单位。一般多认为两串5个的贝或两串10个的贝为“一朋”。

在商代中期以前，贝币价值很高，臣下若能获得商王用贝的赏赐，那可真是极大的荣耀。商代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交易范围不断的扩大，中国北方因不易获得数量众多的南方海贝，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这时，人们又想出了以其他材料仿制贝形货币的方法，如陶、石、骨、玉、铜、金等，其中铜仿贝的发明是中国金属铸币的开始。其中有一种表面包金的铜币是作为大额货币使用的，现存世量极少。蚌贝因一出土就容易损坏，故保存完好的不多。境内在历次的考古发掘中有不少的贝出土：

1972年3月,贵州省博物馆在黔西县林泉区野坝和罗布垮等地,清理发掘了古墓10余座,其中东汉墓7座,有4座被盗和扰乱,仅3座完整。出土贝壳30多枚,2号墓出

土，长约2厘米。背面磨平，中间有孔，作穿系之用。

1978年，在威宁中水区中河公社黎园二区的西汉彝民将军墓中，发现一装有海贝的铜器，其中一部分贝已残损，所存完整的有20枚，总重41.8克，一般的长1.5—2.5厘米、宽1—2厘米，正面扁平，中间有缝，缝沿有齿，背面鼓凸。有17枚被磨穿，现一绿豆大的孔洞；有3枚背面磨平，无孔，保存海贝原状。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墓内又发现6枚，散放2处，与云南西汉墓葬出土的海贝形态相同。（《贵州省志·金融志》）

贝在境内屡有出土，说明古夜郎地区在春秋、战国或更早就出现了商品交换，商品经济有了初步发展，交易是很频繁的。又据史料记载，因贝能够适应于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需要，故境内自春秋战国以后贝又能流通、使用1000余年，对贵州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发生过重要影响：

唐宋时期，贵州境内相当部分分属南诏、大理国领辖。“本土不用，凡交易缯帛……之属”。因其主要使用贝币，民间亦“以缯帛及贝交易。贝者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新唐书·南诏传》）

1253年，忽必烈征服云南，在货币政策方面仍允许云南继续用

贝。至元十九年（1282年）又规定“云南赋税，以金为则，以贝子折纳，每金一钱，直贝子三十索。”

元代，境内今兴义、兴仁、安龙、普安、晴隆等地属云南普安路总管府领辖。元《混一方輿胜揽·云南行省说》载：“交易用贝”。贝的单位称庄、手、苗、索，采用四、四、五进位制。一索币计八十枚，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虽租赋亦用之。每百索值银一两。并规定“每金一钱，值贝子二十索。”《元史·世祖本纪》

明初，太祖朱元璋派兵入滇，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改土归流，修整水利，传授内地先进生产技术，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但在货币问题上，发生了与元王朝同样的情况。大明通行宝钞不能顺利推行，银两只能用于大宗贸易，准许民间沿用贝币，规定可以用贝币缴纳赋税。

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贝币不断贬值，人口不断增加，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货币需要量大增，土司纳贡一次，需用贝79,800索，约合600余万枚，贝币已完全不适应市场交易的需要。但成化十七年（1481年）十二月，因今贵州西部地区大明宝钞难于通行，当局发放官俸搭发贝币，故贝币在民间照常通用。弘治三年



(1490年)后,贵州矿业发展,省内虽已开始鼓铸铜钱投入市场使用,但用贝习惯尚难改变。

南明永历元年(1647年)春,大西军领袖孙可望进入贵州,铸行大顺、兴朝通宝铜钱,颁布“行钱令”,废贝行钱,严禁海肥流通,违者“劓”(割鼻子)之”,以政治力量迫使贝币缩小流通范围。但至“国初尚用,及后制钱行而贝不行矣。从此海贝退出流通领域,改作饰物佩戴或收藏。

境内少数民族以海贝作为装饰历史悠久。

成书于明弘治年间的《贵州图经新志》卷之十一记载“龙里卫……境内东苗之夷,性戇而厉,男子科头赤足,衣用青白花布,领缘以土锦。妇女盘髻,贯以长簪,衣用土锦无襟,当幅中作中孔,以首纳而服之;别作两袖,作事则去之;杂缀海肥、铜铃、青白绿珠为饰。”这是境内关于妇女用海贝做饰品的最早记载,距今已有600年的历史。此后,境内少数民族用贝作装饰的记载不绝于史:

明万历年间郭子章的《黔记》中记叙黔南龙里卫一带“妇女朵海肥、铜铃、药珠、结纓珞为饰”。

成书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大定府志》载:“披袍仡佬,性稍淳,力耕作,男子装饰无花,女子用青线杂发中而束之,青

布为带袋以括发,加海肥其上为饰,衣长仅尺许,衣上复披袍,故名。”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第4卷 民族志》载:“平塘通州、西关,长顺代化等地苗族……年轻妇女出嫁前都将长发挽于头顶。发髻前后用若干海肥串作‘头珠’,挂在横插的两支银簪上。胸佩8至12个银项圈,耳戴圆形银环。婚后均包兰色头帕;贵定、龙里、惠水等地部分苗族妇女服饰,即以海肥作为主要装饰品的苗族服饰。至今,云雾山周围,即贵定云雾、昌明、沿山和龙里、惠水的一些边远地区苗族,还保留海肥为主要装饰品的习俗。这一带苗族妇女的海肥,主要装饰在背牌上。整个背牌长70公分,宽12公分,尾部用25个海肥连成一串,每个背牌上装饰3至4个海肥,配以小银铃和银制小鲤鱼等物,‘结纓珞为饰。’

《贵阳风物志》载:“在苗族‘游方’活动中,‘射背牌’定情,算是最隆重的仪式了。在贵阳花溪高坡一带的苗族中,流行着四月八射背牌的传统。背牌,是苗族妇女上装的组成部分和装饰,由前后两块相连的布片精工刺绣而成。戴时从头上笼下,后片披在上,前片吊在胸前,并压在腰带上。背牌中间的花纹图样,以黄丝线为主绣

成,并缀满闪亮的银片和海贝者,称“黄牌”,是专供“射背牌”时的靶子。射中背牌的双方,即正式确定恋爱关系。

以海贝作为装饰的苗族自称“蒙让”,意为田坎的苗族或湖畔的苗族。他们主要分布在长顺、惠水、贵定和龙里一带。也有称“青苗”或“海肥”苗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从江海湖泊沿河西迁而来,为了忘记祖先生活的地方,故把带来的海肥和银饰品一起佩戴于胸背上,这部分苗族的祖先是云南辖境迁徙到黔南来的,他们曾经用贝币交易过,并因贝币的贬值而大量保存了海肥,于是海肥还其单纯的器饰宝藏的面目,成为苗族妇女们的珍爱之物而世代相传至今。久而久之,便成了妇女们的装饰品了。

背牌从中开口,前短后长,胸前用红、黄、蓝、藏青、黑五色丝线刺绣成正方形印章图案。后背绣斜雨纹和云雷纹,周围用小银泡镶边,尾部用80多枚海贝编排成横线和花形为坠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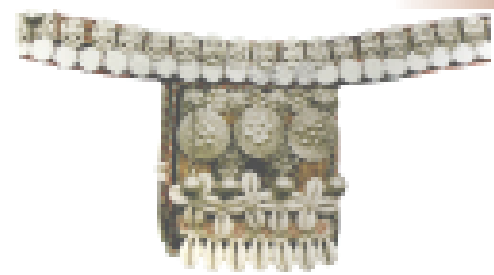
据实地了解,这支苗族分布在贵定、惠水、龙里三县结合部的崇山峻岭中,妇女们几乎都有海贝装饰的背牌。为此,这支苗族被称之为海贝苗。



贵定平伐镇苗族妇女的背牌



摆榜式苗族服饰



这是以贵州省惠水县摆榜乡为代表,分布于惠水县摆榜和平塘县西关、大塘、上莫、掌布等地,被命名为摆榜式的苗族服饰。

少女四周留短发,顶发打髻于头后,垂发尾。髻上插银饰和红线





花。妇女绾发髻于头后，插木梳。上穿对襟青布短衣。衣襟饰以花纹，披长方形背牌，牌上装饰圆形银花和海贝。下着青布百褶裙，裙脚缀白布滚边。系蓝布腰带，拴银铃、银花飘带。缠青布绑腿，穿布鞋或草鞋。

——《中国苗族服饰图志 中英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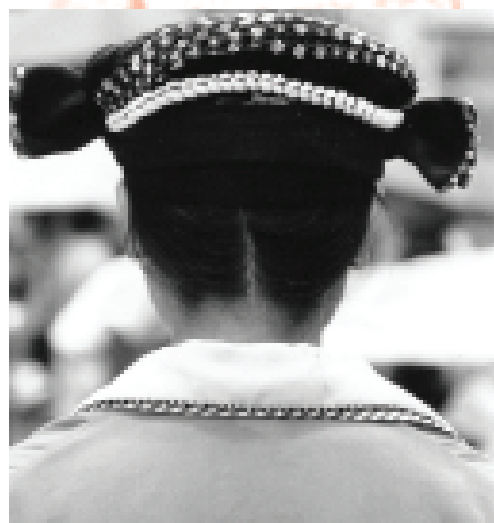
卡罗式苗族服饰

这是以贵州省平塘县卡罗乡为

代表，分布在该县卡罗、谷洞、卡腊、牙舟等地，被命名为卡罗式的苗族服饰。

少女头顶部留长发，四周剪短发，头后打髻插红梳。妇女绾髻于头后，呈钩状，插骨簪子，额头围海贝花。上穿贯首长袖衣，前摆短至腹，后摆长至臀。前后摆、衣袖缀桃花图案，后摆连彩穗。下着青布百褶裙，系青布腰带。缠白布绑腿，脚穿布鞋。戴项圈、银链和耳环等银饰。

——《中国苗族服饰图志 中英文本》



望谟苗族妇女海贝头饰

（作者

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档案局 局长

贵阳市第一中学合作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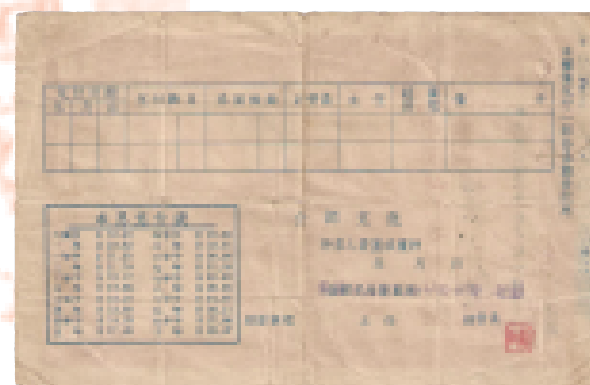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高级中学教师

贵州省钱币学会会员）

贵阳人的准货币

——加盖“贵阳”字样的节约建国储蓄券

黄成栋



民国政府在1932—1935年间推动的货币制度改革，为抗战前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通过实施“废两用元”政策，民国政府统一了货币的对内价值，实现了货币发行的标准化，纸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后期法币被迫退出流通市场。国民党政府还成立了以经营进口军火为主的“中央信托局”和以吸收小额储蓄、经营居民汇兑业务为标榜，广设分支机构的

“邮政储金汇业局”，合称为“四行二局”，是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金融体系骨干。

在民国政府财政收支极大悬殊，举债度日和中华民族浴血抗战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推出节约建国储蓄券作为准货币。

民国政府为维持政局稳定，以吸收游资、调节金融、充裕抗战资金的名义，颁布了《节约建国储蓄券条例》。财政部委托中央信托





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金融机构联合发行“节约建国储蓄券”。自1940年起至1948年施行金圆券币制前夕为止，民国政府先后在国内推行发放甲、乙两种不同版别的“节约建国储蓄券”计有8种面额。当时正面临物价上涨、法币贬值，民众怨声载道的困境。中央财政吃紧、金融状况混乱，钞额逐渐加大、部分地方因兑换现钞过多而发生钞荒。以新印发之“节约建国储蓄券”一改储蓄性质，作为透支现钞周转，这种情形，实际上是民国政府中央财政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迫不得已所采取的措施。此举为中国近代货币发行史所罕见。

笔者收藏了一套民国时期的“节约建国储蓄券”，其中“拾圆”券（见图），长：16.3cm，宽：10.8cm，正面为红色图文，背面为蓝色图文，由“中央信托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联合发行。属“甲种”券，编号：H1920646，分号：16346，民国三十一年九月，具体由“中国银行贵阳支行发行”。该券正面下有“依照后表兑付本息”字样，背面印有“本息对照表”。

从1938年12月至1942年3月，国民党政府为“抗战建国”，以筹措建设资金和稳定通货为由，先后颁布了《节约建国储金条例》、

《节约建国储蓄券条例》和《发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办法》。方法是“劝储”，银行贷款必须按比例搭配，如贷款时要在贷款总额中搭发20%储蓄券，实得80%的贷款，然后，以搭发的储蓄券可向银行作为抵押贷款，但只能借到券面金额的50%左右，借时再按比例搭配储蓄券。

据《贵州金融大事纪要》载，为推行“节约储蓄券”，1940年10月1日，贵州四联总处成立“全国节约的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并制发了《全国节约建国储蓄运动竞赛及核奖办法》推进储蓄业务。

“贵州省节约建国储蓄团”于10月1日在贵阳成立，省主席吴鼎昌兼任省劝储团团长，省会各机关、团体负责人、各县县长的为分、支团长。1942年4月3日，“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贵州分会”决定，当年“节储”任务是8000万元，号召全省公务员参加储蓄运动。据《贵州省档案馆》51宗29、79卷统计，从1942年至1946年6月，贵阳中央信托局“节约储蓄券”的法币存款余额为：1942年4843325元，1943年628698元，1944年565892元，1945年1,466,352元，1946年1658375元。

（作者：贵州省钱币学会常务理事，原贵阳市云岩二中退休干部）

潞州交子印版考

田秋平

内容简介：

交子，我国北宋时期的纸币名称。从众多史籍资料记载可以看出，纸币交子在北宋发行时，已经开始采用了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印刷技术。而且是“朱墨间错”的双色套印^①。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我国至今没有纸币交子实物的出土发现。那么，印刷纸币交子的印版实物又是什么情况，一直以来，有一枚青铜印版，在学术界广为引用在《中国货币史》《中国古钞图集》



《中国通史》《中国印钞通史》《中学历史课本》等等诸多书籍里。本文就此枚发现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青铜印版实物进行考证研究，论证此青铜印版即北宋熙宁二年朝廷在河东潞州发行流通的纸币“潞州交子”。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发现于山西境内的“潞州交子”使用的纸币青铜印版，该印版现收藏在日本的“田中清岳堂”。

青铜印版的发现与考证

1935年，在日本出版的一部《东亚钱志》上刊登和披露一枚青铜印版，文章中言称，收藏此版的是日本“田中清岳堂”。

青铜版竖五寸二分，幅二寸。版面有边沿线，上绘“十枚制钱”，中写“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下画“屋木人物”，是“传世绝少之物”。这些信息文字披露在《东亚钱志》上。该印版的出现，在我国引起极大反响。不久，中国著名钱币学家王荫嘉在《泉币》第九期称其为



宋朝“交子”，“交子版之久离国土耶”；著名钱币专家彭信威在写著的《中国货币史》（1954年版）称其为“官交子”；《中国古钞图集》（1987年）称“此版系于宋朝”。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郭彦岗在他们的《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称此印版“北宋的官交子或钱引”。上海著名纸币收藏家吴筹中说：“北宋钞版一出，即为日本研究中国钱币者以重金购去，目前仅能见到原版拓片” ②

据传，该铜质印版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土发现于山西境内，并流入古玩界，后因所索要价格昂贵，及国内军阀混战，导致其流失国外。在我国国内目前仅存原印版的纸质拓片。^③从考证、研究纸质拓片实物看，笔者认为它应该是北宋时的潞州交子印版。现探秘论证如下：

第一，彭信威在其《中国货币史》中讲“官交子的形制，大概和私交子差不多”。他的依据是宋朝的交子发行人转运使薛田在上报朝廷奏文中说：“其交子一依来自百姓出给者宽窄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记”。官私交子既然“差不多”，那么，确定它们的设计风格 and 形制就成为确定是否“交子”的重要依据。宋人李攸在《宋朝事实》有对交子的详细描述：“诸豪以时聚首，用同一色纸印造，印文

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贯。街市交易。”这枚印版上“十枚制钱”、“屋木人物”、“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的图案、文字已说明它是符合北宋纸币交子早期这些基本特征。特别是印版中“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的文字，为我们确定了印版的时代和面额。

据《宋史》载：“宋太宗时，官方正式规定公私出入，一律都以七百七十文为一贯、七十七文为一陌”。这一段史料证明交子印版的时代当为宋朝初中期，因为历史上只在这一段时期使用这样的币制换算标准。依此史料计算，七十七文为一陌，七百七十文为一贯，那么交子票面上的七百七十陌即应该计算为“十贯”。能够确定该印版面额为“十贯”的还有一点依据，它是来自该印版自身图案“十贯制钱”的佐证。那就是说，印版上方的“十个制钱图案”，我们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单独个体制钱的平面图案的点缀设计。古人在设计印版时，是主题突出的，要在有限的方寸空间，力图尽量展示印版的主题思想、行使作用等等文字信息的。具体到这十枚制钱的设计展示思想，笔者观点，他是一贯贯制钱，

摆成十摆后的一个俯视效果图。北宋纸币交子这种用“钱币图案来展示纸币票面面额”的设计风格，在后来的元、明两朝的纸币实物图案中就可得到印证，只是，元、明两朝纸币上的一贯贯的制钱图案由早期交子的“俯视图”衍变成为一贯贯穿起来的“正视图”罢了，而且较交子的视觉效果更为直观明了。

第二，在考证了此印版为宋交子印版后，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它是哪里使用的交子版？在印版中间有一段清楚的文字内容：“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等字样。四川区域性纸币交子的专门发行机构于1023年在益州（今成都）设置；它叫“益州交子务”。

而此时段设置的潞州交子务在全国来讲，成立时间仅次于四川益州交子务，两处官方设置的交子务，一处在我国西南地区的益州（即今成都），1023年设置；一处在我国之北方地区的河东路（今山西）潞州（即今长治），1069年设置。除此之外，全国在这一时段里，没有相同性质的纸币发行机构存在，所以说，潞州的纸币交子，此时在发行流通到广大的民间市场时，反倒需要十分强调一下“除四川外”，言外之意特指该版是“四川除外”的潞州交子了，使用中避免造成纸币交子在市场中的不必要

的混乱。

当时的北宋，即便是这之后，朝廷在别处又设置了新的纸币发行机构，那也因时间的不同、币制的不同、省陌制度的不同、环境的不同、钞版设计风格的不同等诸多因素的改变，导致这以后纸币交子印版设计的差异，已不具备宋朝人李攸在《宋朝事实》讲的宋朝初期交子“印文用屋木人物”的形制风格，而且，制钱的“省陌”制度也有所变化，早也不是宋初的“七百七十陌”的省陌计算单位了；这两点就否定了该印版是后期纸币印版的可能性。那么青铜印版上所明确的文字“除四川外”的行文规定，只能说明，符合以上种种情况，又能用此版印刷纸币交子的地方，只有北方的河东路潞州交子务及与其所属潞州行政辖区的相关“诸路州县”了。

所以，后人在著《两宋货币史》谈到此青铜印版时，其学术观点是这样的：“此印版肯定不是四川交子，因为拓片文字标明它不在四川行使。”④

第三，在此枚印版中部的右上角，我们发现“千斯仓”三字，这之前，人们对千斯仓的含义没有做出过解释。一枚纸币印版上出现千斯仓它的含义是什么，这里阐述如下。千斯仓，其原始本意是“千仓万箱”，解释为“丰年好收成，

储存的粮食非常多。“千斯仓”最早出自《诗经·小雅》里的《甫田》一篇，原诗是这样写的：“曾孙之稼，始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诗的大致意思在告诉后人“周成王庄稼堆成山，多如房屋高如梁，露天谷仓无边际，多如沙丘高如冈。需要千仓来储存，需要万车来搬运。”千斯仓用于北宋的交子印版之上，是在充分体现朝廷的货币发行资源“多不可竭，源远流长”。古人这样的“千斯仓”文字设计在纸币的印版上，是符合纸币印刷发行、流通使用理念的。

第四、北宋时期的河东路（今山西），很早就是中国印刷制版的中心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印版实物，是这一时期“四美图”的出土发现⑤，雕刻有“平阳姬家雕印”工匠，技艺精湛，印版人物设计细腻、表现手法独到、整体布局考究，堪称印版史上的鼻祖之作。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分析，潞州交子印版的制作也应该没有什么难度，我们分析它就来自于河东路雕版中心平阳府。一块印版让得天独厚的河东路平阳府雕版师来制作，朝廷可以不用“舍近求远”，还可减少制版成本和诸多路途上的不安全隐患。而对于河东路来讲，为朝廷做这样的印版，那是自家的看家本领，“轻车熟路”“手到擒拿”的

一件事情。

第五、印版中心图案的设计思想，更能突出反映出潞州交子的发行特点与背景。三个人物，手包肩扛笨重的袋装物品，背景是木屋“千斯仓”两开间的门脸，和一层层横向的当物门板。袋装物是什么？我们虽不能直观看到，但有印版右上角“千斯仓”三字的定名，这袋装物里的东西便不难确定。财物一定是袋装物的主题，不外乎“钱币、粮、茶、盐”等等之类了。这些财物在北宋时期，那都是可作为纸币交子发行时的实物准备。关于这些类别的袋装实物问题，我们在宋史资料里也确实见到有过记载：“国初盐茶，初未有客钞，雍熙二年（985年），令河东路（山西）商人，如果折博茶盐，令所在纳银赴京请领交引，盖边郡入纳算请，始见于此。”再有宋人陈止斋言：“端拱二年（989年）十月置折中仓，令商人入中斛斗，给茶盐钞，盖在京入中斛斗算清，始见于此。⑥”意思大致是，让商人以入谷粟，向政府换回茶盐交引，而商人持茶盐交引去指定地点换取茶盐实物买卖获利。这是河东路（山西）潞州交子在熙宁二年（1069年）发行之前，河东地区的商人就已经向政府“入实物，领交引”的两段确切的文字记载。

第六，这枚发现的惟一交子铜

质印版，据传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土于山西境内，后来因战乱流入日本。早年山西人氏在琉璃厂开设“书业堂”的已故著名的古籍收藏大家崔贞礼老先生，在其回忆笔记资料里，同样也持“山西出土发现”之观点⑦。这说明一点，当时印版的使用地在北方河东路（山西），而非南方，更非西南之四川。

第七，潞州冶铁所铸钱币，是在整个河东多个州县流通的，是铁钱的主要铸造地和流通区。铁钱笨重所带来的诸多不便，影响到了整个河东地区及周边的商品贸易和经济发展。所以说，朝廷有在此发行交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就有了潞州纸币交子上，特别印制的“许于诸路州县行使”的文字说明。

这里需特别说明，最为遗憾和
对考证带来诸多困难的是，古玩界
口口相传，该青铜印版的背面有数
十字的凿刻汉字，《东亚钱志》作
者奥平昌宏不知处于什么目的，始
终未对世人披露。而其青铜印版的
收藏者日本“田中清岳堂”自《东
亚钱志》书籍出版后，再未有在钱
币界露面。故此，今天的考证，我
们只是在无比遗憾中的一次摸索，
抛砖引玉。希翼有朝一日，钱币界
同仁再在日本见到此青铜印版的真
容。那时我们面前的青铜印版，它
本身的凿刻文字就会告诉我们许多

目前的未知，和惊天的未解之谜。

王安石与潞州交子务的设置

在论证出印版为潞州交子后，有一个问题也需要我们有所了解，这更有利于我们对朝廷为何在河东（山西）潞州设立交子务？为何在北方的潞州发行纸币交子？也更有利于对潞州交子印版的进一步认识。可以看出潞州交子在历史上的贡献和作用。

我国北宋熙宁初年，也就是王安石力推“新法改革”刚刚开始，朝廷在太行山天脊之地的潞州（今长治）设立了一处经营纸币的金融机构“潞州交子务”，这是中国金融历史发出的一缕曙光。当时，力主设立这处纸币交子发现机构者不是别人，他正是我国著名的改革家、文学家、主管国家财政的三司条例司的负责人王安石。从此，在中国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写下了王安石与最早纸币交子发行、与金融机构设立的辉煌历史篇章。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北宋时期我国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改革派。从熙宁二年(1069)到熙宁九年(1076)的八年内，在皇帝宋神宗的极力支持下，由他主持先后实施了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等多项富国强兵

的变法改革。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任朝廷参知政事（副宰相）、三司条例司主持时，曾上疏皇帝赵顼（宋神宗）在河东路的上党潞州（今长治）设置“潞州交子务”，对推进我国最早纸币交子在北方地区的发行流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北宋时，河东路为铁钱的主要行用区域，铁钱流通使用范围包括并、代、忻、汾、辽、潞、泽、晋、绛、慈、隰、石、岚、宪、丰、麟等十七州和平定、火山、定羌、宁化、岢岚、威胜等六军以及永利监、大通监。当时，这些地区的人们公私交易多用铁钱，小笔买卖还可，若遇大宗生意，深感铁钱笨重。《宋朝事实》有载：“小钱每十贯有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三、五贯铁钱就难以提携”。河东路不仅仅使用流通铁钱，宋朝政府还在此设监冶铸铁钱。冶铸铁钱和行用铁钱，给河东商业贸易带来诸多不便，百姓叫苦不迭。在商品流通领域起着特殊等价物的铁钱反倒成了阻碍流通之瓶颈，商品货币之间矛盾日趋尖锐。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市场交易的发展。

河东路流通铁钱所带来的许多问题，由一位叫高遵裕的官员（宋真宗高皇后的伯父、时任安

抚副使、受命知军事)上奏到王安石主持的三司条例司,同时他提出了解决铁钱流通劳苦的办法“乞置交子务”。三司条例司,由宰执、枢密兼领其事,实际上,这个机构不仅是整理财政的机构,而且是主持变法的总枢纽。均输、青苗、农田水利等法都是由这里负责制订,并用它的名义发布出的。按王安石本人的说法,三司条例司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是为了“理天下之财”。高遵裕的货币思想很受力主变法的王安石的赏识,更与王安石实施的均输法、青苗法节拍相一致的地方。王安石随即奏报神宗皇帝。“交子之法,行于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官私苦运铁钱劳费,请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神宗很快从之。“熙宁二年(1069)诏置交子务于潞州”。⑧

北宋朝廷将纸币的发行机构“交子务”置于潞州，目的很明确，因潞州属全国十五路之一的河东路，是昭德军所在地。人口79232户，冶铁、采煤、制陶、贩盐等商品经济异常繁荣。潞州东邻邯郸，西接平阳，北经威胜军（今沁县）可抵河东路路治并州府（今太原），南出泽州（今晋城）可达京都汴梁城（今开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有

“得上党（潞州）者得天下”之称。所以说，北宋政权将全国性的纸币交子发行机构设在潞州，其纸币推行范围不仅仅只限于潞州，更主要的是我国北方河东路（山西）及部分相邻的广大地区。

潞州交子的历史使命

当时，置潞州交子务的事宜具体由河东转运使刘庠操办。

潞州交子发行流通后的熙宁三年（1070年）七月初，一天，河东的专门管理地方财政的转运使刘庠突然上书朝廷言：“交子法行，商贾不肯中纳粮草，不惟有害边穀，亦恐盐矾不售”。就是说，老百姓不肯用粮食请领交子，对纸币交子的认可度还不是很，而且纸币交子发行流通，还直接影响了河东盐池食盐的运输和贩运问题。

地方官的上奏，朝廷在经过激烈的斗争后，改革派王安石的主张被朝廷的反对派给予否定。这年七月初十日，潞州交子务遂奏罢之。这段历史同样被后来的《续资治通鉴卷68》做了记录。

潞州交子务如此全国性的机构为何旋置旋罢？从我们掌握的史料分析研究发现，除转运使刘庠上书朝廷的种种理由之外，最关键的是新法改革派王安石同新法反对派领袖司马光为代表的斗争因素。

河东路的转运使刘庠是新法的反对派，同王安石的思想观念大相径庭、南辕北辙。

《明·山西通志》曾有这样的记述：“刘庠以论新法违背王安石；不顾铁钱之劳费，计一路之产，铁利为富足，请恢复旧冶，继续鼓铸铁钱。”王安石极力推行新法，力图使纸币交子不仅仅在四川能够流通，更想让“受劳费之苦”的河东等地区的“诸路州县”也能行用。但熙宁三年已升为宰相的王安石身在朝廷，国事缠身，加之反对派毫无忌惮地抹煞历史事实，致使王安石没能亲自来到潞州看看转运使刘庠上书内容与河东潞州的实际情况到底有多大的出入。可能就连王安石他主持的三司条例司的其他官员也没有深入到潞州进行调查了解，就草草地将潞州交子务奏罢。

宋朝纸币交子分界发行，实足两年为一界，界满换发新交子。每界最高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准备金三十六万贯。

潞州交子务熙宁二年设置，熙宁三年奏罢，时间仅存在一年左右，当时的潞州交子发行，由于受朝廷保守派、王安石新法改革反对派以及河东管理财粮的转运使刘庠上奏朝廷等方方面面的阻挠，纸币交子只发行了一界，也就是一百多万贯，就匆匆退出了货币历史舞

台，成为了新法改革派与反对派斗争的牺牲品。

数年后，王安石被罢去宰相位置，许多变法改革活动的实际材料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改革反对派以及声气相通的封建文人的篡改抹煞，使后人难于洞察到事实的真象。故此，导致至今潞州交子务发行我国最早纸币这段货币史实鲜为人知，史籍记载中也只见寥寥数笔。

注 释：

①【宋】李攸《宋朝事实》对纸币交子双色情况的详细描述：“诸豪以时聚首，用同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

②吴筹中《中国钱币》“再说两颗明珠” 1987年 第3期

③田秋平《纸币初始晋东南》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7年

④汪圣鐸《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

⑤《四美图》，北宋时期“平阳姬家雕印”的木版年画，专家称为中国艺术的瑰宝，是中国古代版

画艺术的代表作，堪称中国民间美术史上划时代的精品。印版题有“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印版别具匠心地把两朝人物联在一起，创造了一幅生动活泼而个性鲜明的“四美图”。清末时，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中国古西夏王朝黑水城（甘肃省内）旧遗址古塔中发现。目前，雕版实物保存在俄罗斯的博物馆内。

⑥【宋】马瑞临《文献通考》（卷15） 中华书局 1954年

⑦崔礼贞（长治县人）清末民国年间在琉璃厂开设“书业堂”古籍书店。后人保存《书业堂笔记》手写本（未刊稿）。著名钱币收藏大家郑家相在《泉币》上有言：“行在会子钞版，出自北地，民国二十五年夏，北地泉商寄拓本陈君仁清，索价甚巨”。

⑧关于“潞州交子务”的历史事迹，《群书考索后集卷62》、《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食货志》、《山西通志》等典籍中可见记载。

（作者：中国钱币学会专家库成员

上党钱币研究会理事长 长治银行研究院 院长）

钱币上的“福”文化

叶真铭

福文化是中国民俗吉祥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精神家园和世代传承的文化瑰宝。有学者归纳，中国民俗吉祥文化包括福、禄、寿、喜、财、吉、和、安、养、全十大方面的内容。《诗经·小雅·瞻彼洛矣》说：“凡言福者，大庆之辞。”福文化就是吉祥文化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它凝结着中国人的伦理情感、生命意识、审美情趣、民俗习惯和信仰追求。中国民间历来有追求美好生活、祈盼吉祥幸福的精神愿望，因此中国人对福文化具有天然的亲近感，福文化已经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几乎可以说无所不在。

钱币与人们生活关系最为紧密，因此钱币自然成为承载表现福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从古至今，蕴含福文化内涵的钱币层出不穷，种类繁多，在人们生活当中随处可见。人们不仅直接在钱币上书写“福”字以求吉祥，还巧妙地运用幸福吉祥的文字以及神话人物、走

兽、花鸟、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图案、纹饰和符号，通过借喻、谐音、比拟、双关、象征等手法，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关注、对美满生活的向往、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历代具有福文化内涵的钱币，都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生命意识、理想追求、审美情趣和美好愿望，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故而倍受关注和喜爱。

“福”字入钱增吉祥

“福”字是我国出现较早的古文字之一。甲骨文中就有160多个“福”字，其字形是“两手捧酒献于祭台上”（图1）。古人以酒象征生活的富足、完美，因此古人在祭祀时总是把装满美酒的器具呈献在神的面前，以祈求幸福。《说文》：“福，祐也。从示，畎声。”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甲文）像两手奉尊于示前，或省升，或并省示，即后世之福字。”“福”字从字形上看，左边为“礻”，意为“神祇”，而右边由“一”、“口”和“田”组成，“一”字按《说文》解释为

“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口”字，《说文》解释为“口，人所以食言也。”“田”即指耕地、打猎。这个福字，寄托了古人祈求得到田地、以满足温饱需求，又得到神灵保佑、过上富贵生活的美好愿望。因此历代铸造了大量带有“福”字的钱币，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历代“福”字钱币，既有官府铸造的正式流通钱币，也有民间铸造的不参与流通的民俗钱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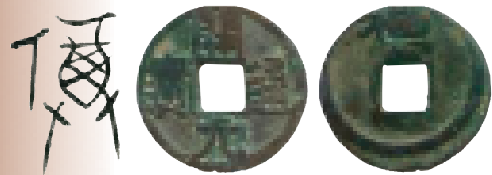


图1

图2



图3

图4

流通钱币上出现“福”字，目前所知当以唐会昌开元背“福”字钱（图2）为最早。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后，社会经济遭受重大破坏，出现严重的“钱荒”。加之寺庙遍布，众多僧尼均依赖官府供给，财政负担沉重。会昌年间，唐武宗为减轻财政负担，诏令废灭天下佛教，拆毁各地寺院，以佛像等铜器铸钱。淮南（今扬州）节度使

李绅率先铸造进呈一种背面铸有“昌”字的“开元通宝”钱，“昌”纪年号“会昌”。各地州郡纷纷仿效，铸造背面有本州郡名的开元钱，统称“会昌开元”。会昌开元背文共有23种，其中一种即为“福”字。会昌开元背“福”字钱，是福建福州所铸，“福”字一般在穿上，穿下及穿右者罕见。五代后梁时期（916年），统治福建的闽王王审知铸造铅质“开元通宝”钱，有大小两种，背后也有“福”字（图3、4）。

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铸造“天福元宝”铜钱（图5、6）。五代后唐末年，天平节度使石敬瑭起兵造反，向契丹求援，割让幽云十六州，每年纳岁绢三十万匹。在契丹援助下，击灭后唐，建立后晋政权。石敬瑭对于契丹百依百顺，甘心奉比他小12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自称“儿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儿皇帝”。石敬瑭依靠契丹的力量捡了个皇帝当，认为是上天赐福，因此改年号为“天福”，并铸“天福元宝”钱。存世的天福元宝钱，铸造粗糙，钱体薄小，并没给老百姓带来幸福，却将“儿皇帝”石敬瑭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辽兴宗耶律宗真景福年间（1031-1032）铸造有“景福通宝”年号钱，隶书旋读，光背，传世少见。

300多年后，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铸造有“大中通宝”钱，也在钱背加铸地名。“大中通宝”背“福”字钱，是平定福建割据势力后在福建铸造的，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五种面值，铸造数量不多，迄今罕见。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后，开铸“洪武通宝”年号钱，钱背也铸有地名。福建行省宝泉局铸造的背“福”字钱是洪武通宝九种纪地钱之一。

“洪武通宝”背“福”字钱（图7），“福”字铸于钱背穿上，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五种面值。其中较为多见的是洪武通宝背“福”小平钱，其钱文“宝”字有岳宝和尔宝二种写法，“通”字有单点通和双点通等多种版别。



图5

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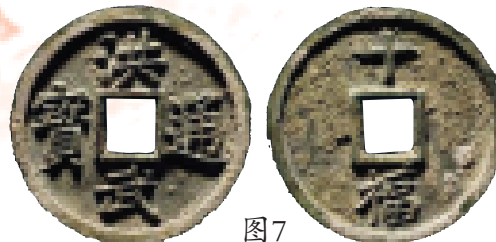


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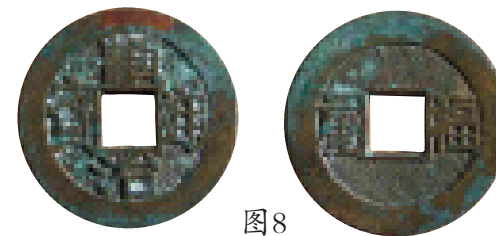


图8

清顺治年间，铸造五种形式“顺治通宝”钱，史称“顺治五式”，从而确立了清代的货币体系。顺治钱二式，在钱背铸汉字纪铸钱局，称“顺治单字记局式”。顺治六年（1649年）福建省铸钱局开铸顺治通宝背“福”字钱。现仅发现有穿上“福”字者，《古泉大全》记载的穿上“福”字钱未见实物。此后，福建省铸钱局又铸造背有汉字“一厘·福”字样的顺治通宝权银钱（图8）、顺治通宝背满汉文“福”字钱、康熙通宝背满汉文“福”字钱。《古钱大辞典》记载，雍正年间规定各省铸钱背面钱文用满文，“皆用宝字为首，次用各本省一字”，从此成为定制。《古钱大辞典》收录有一枚雍正通宝背满文“宝福”钱拓图，但至今尚未发现实物。乾隆至宣统年间，福建宝福局都铸造有背为满文“宝福”的年号钱（图9）。还发现有乾隆通宝背穿上“福”字钱以及乾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背满汉文“福”字年号钱，皆不多见。1911年辛亥革命福建光复之初，中华民国闽军政府铸造发行了“福建通宝”圆形圆孔铜钱投放市面流通，有一文（图10、11）、二文两种面值，这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种以省名作为钱币名称的铜钱。还有圆形方孔的“福建通宝”背“省造二文”、“福建省造”背“二文”试铸样钱，存世罕见。



图9

图10



图11

图12

这些历代铸造的带有“福”字的钱币，虽然不是专门为祈福所铸，但因有“福”字寓意吉祥，满足了人们祈福纳祥的愿望，故而倍受追捧。所以官府、民间也铸造了大量带有“福”字的民俗钱币。在古代民俗钱币中，“福”字钱占了很大的比重，如“福寿双全”、“福寿康宁”、“福寿长春”、“福寿齐增”、“福禄寿喜”、“福禄万代”、“福德长寿”、“福海寿山”、“福自天来”、“福星高照”、“福在眼前”、“天官赐福”、“寿福康宁”、“福如东海”、“德福寿禄”、“太平福象”、“福寿延年”、“万福来临”、“驱邪降福”、“福寿齐天”等等，不下数百种。还有一种超大型百福百寿图花钱（图12），直径101毫米、厚4.2毫米、重270克。黄铜铸造，雕刻精美，古朴雅致，品质精良，包浆纯熟，润泽自然。钱文一面是54个

“福”字，一面是54“寿”字，正面文字排成三轮，内轮13字，向外依次为17字、24字，背面也有54字，每字各有千秋，互不雷同。以篆书为基础，尚有金文、钟鼎文等，钱文点画分明，书风蜿蜒曲折、稳重端庄、千姿百态，极有韵味，尽显我国古文字绚丽多彩的无穷魅力。图文设计奇妙，排列整齐，布局合理，构造和谐，拿在手中赏玩，若饮醇酒，如品佳茗，油然而生福在眼前、寿与天齐之幸福感，一股快乐祥和的气氛扑面而来。



图13

除了古代钱币，现代发行的钱币上也常常可见“福”字。2012年开始，我国澳门特区大西洋银行及中国银行每年发行一枚生肖贺岁钞，目前已发行了壬辰龙年、癸巳蛇年、甲午马年、乙未羊年、丙申猴年5款生肖贺岁钞。每款生肖贺岁钞正面都印有中文“福”字，以表达美好的寓意（图13）。中国人

民银行发行的2005年鸡年贺岁普通流通纪念币，背面灯笼图案内有“满堂福”字样（图14）。2008年鼠年贺岁普通流通纪念币，背面有一幅对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寓意新春快乐。中国人民银行从2014年开始每年底发行一枚贺岁银质纪念币（图15），以“福”字为主题设计图案，呈现给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画面，传承文化，寓意吉祥，倍受收藏爱好者追捧。



图14



图15

吉语口彩送祝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福”的概念内涵非常丰富，如我们常说的“五福”。“五福”的说法，出自古典籍《尚书·洪范》：“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修）好德，五曰考终年（命）。”长寿是命不夭折而且福寿绵长；富贵是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康宁是身体健康而且心灵安

宁；好德是生性仁善而且宽厚宁静；善终是生命即将结束时，没有遭到横祸，身体没有病痛，心里没有挂碍和烦恼，安详而且自在地离开人间。简单说“福”就是活得较长，不受贫穷，身心健康，品德良好，能得善终。这五个方面实际上已概括了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幸福观。只有五福全部拥有才是完美的，其余的各种情况都是美中不足，是有缺陷的福。因此《礼记·祭统》说：“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之谓备也，即富贵、长寿、安宁、吉庆、如意等全备完美之意。”历代铸造的以五福作为主题内容的民俗钱币不胜枚举，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吉语钱。

吉语钱，也称口彩钱，是历代民俗钱币中最为庞大的门类。凡刻铸有吉语祝辞等文字的仿钱物品，均可称为吉语钱。历代官炉、民间均有铸造，其品种极多；其形状各异，有圆形、椭圆形、六边形等；材质多样，有金、银、铜、铁、锡等，其中铜质最为常见。吉语钱上或一面为图形，一面为吉语；或两面均铸“天下太平”、“万寿无疆”、“大富大贵”、“出入通泰”等幸福吉祥的文字，表达祈盼幸福的愿望。吉语钱用途广泛，多用于婚嫁、馈赠、赏玩、祝寿、压箱底及礼佛等，也有作为压岁钱在

过年时赠送给孩子的，主要目的是以幸福吉祥的文字，取其吉祥顺利之口彩，来压邪禳灾和祈求幸福。因此吉语钱表现的主题也是多种多样的，但与五福有关的内容则是历代吉语钱永恒不变的主题。

一是祝颂长寿的吉语钱。

在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这“五福”之中，以长寿为先。长寿是人最重要的幸福，没有了生命，一切幸福都无福消受。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称“寿如山岳福如云”（《临江仙·为岳母寿》），将“寿”比作山，那“福”就是环绕在山间的云朵。可见幸福美满的人生离不开“寿”，所以人们对长寿之福的追求尤为强烈。历代铸行的吉语钱上大量出现关于长寿的祝颂语，如“百千长寿”、“松鹤延年”、“龟鹤齐寿”（图16）、“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松鹤长春”、“鹤寿松龄”、“龟龄鹤寿”、“长命百岁”、“延年益寿”、“福寿”等，充分体现了千百年来人们追求长寿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历代官府钱局还专门铸造了一些钱币呈进宫廷，作为祝贺皇帝生辰的礼物，称为“万寿钱”。“万寿钱”铸造都非常精美，大多为金银材质，存世罕见。如南宋“福宁万寿”金钱，“绍定万岁”、“景定万年”、“圣寿无疆”、“慈元万

寿”、“福寿千春”银钱，“重华万寿”铜钱等，2011年南宋“宝祐万年”银钱（图17）被评为十大“中华民间钱币国宝”之一。存世有清代“光绪通宝”背“福寿”钱（图18），“福寿”二字有篆书、楷书两种写法，有人认为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四川钱局铸造的万寿钱。



图16



图17



图18



图19

二是追求富贵的吉语钱。

富贵，指富裕而又有显贵的地

位。富，富裕，富有；贵，显贵，贵气，地位高。《韩非子》卷六说：“全寿富贵之谓福。”东汉刘熙在《释名》中直接称：“福，富也”，认为富贵就是幸福的。因此对大富大贵、富贵双全生活的追求，历来是封建社会大多数中国人的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历代铸行的“长命富贵”、“大富大贵”、“福禄双全”、“金玉满堂”、“马上得禄”、“加官进禄”、“五子登科”、“马上封侯”、“拜将封侯”、“位列三台”、“状元及第·一品当朝”（图19）、“年年有余”等吉语钱，都体现了封建时代人们对富贵生活的美好愿望，凝聚了人们祈求生活富足、兴旺发达的理想追求，故而一直为人们所钟爱。

三是祈求健康平安的吉语钱。

健康是福、平安是福，寄托了千百年来人们对生命的珍重和生活的挚爱。古往今来，健康平安都是人们最深切的祝福和最热切的期盼。无论显贵还是微贱，无论政要还是平民，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健康和平安都是他们最为渴求的、也是最为难得的幸福。所以历代都铸有祈求健康平安的吉语钱，如“吉康平安”、“平安吉庆”（图20）、“掌福消灾”、“积福消灾”、“植福消灾”、“驱邪降福”、“万病祛除”、

“出入通泰”、“出入平安”、“平安如意”、“平安吉祥”、“六合同春”、“年年太平”、“天下太平”等，都表达了人们追求健康，祈望自身平安、国家安定的诉求，成为人们孜孜以求并随身佩戴的必备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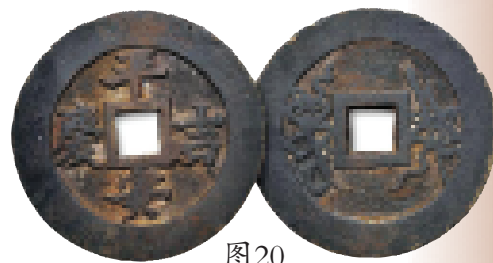


图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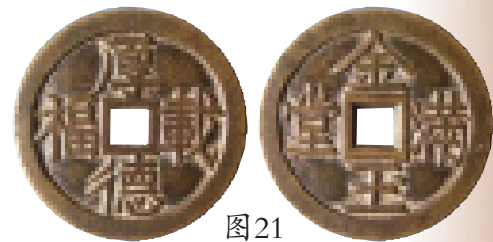


图21



图22



图23

四是推崇积德修福的吉语钱。

追求幸福是人们发自内心最朴素的愿望，牵动着无数中华儿女的情感，千百年来从未改变。古人们很早就认识到福不会无缘无故来的，要想得福，心中必须要有股神圣的正能量来支撑，那便是“德”，可以说“有德才有福，有福必有德”。因此修好德成为“五

福”之一，行善积德作为修福增福的重要实现形式，受到推崇。历代铸造了不少宣扬积德修福的吉语钱，如“积德修福”、“厚德载福”（图21）、“修德积福”、“厚德积福”、“积福修德”、“修德致福”等，表达人们希望通过多积德、广积德，获得更多幸福，成为有福之人的愿望。

五是希望子孙繁盛的吉语钱。

子嗣兴旺、多子多福也是传统福文化的重要内容。古人认为，人是万物的中心，但是人的生命毕竟是短暂的，人们无法超越死亡的界限，因而把自我生命的延续寄托在后代的身上，所以繁衍后代，不仅是接续祖先香火，更是延续人们自己的生命。因此形成多子多福的观念，认为子嗣多了，人丁旺盛，自己就更有福气，一家人能够如意、幸福、美满。所以历代铸造了大量祈求子嗣兴旺的吉语钱，如“早生贵子”、“连（莲）生贵子”、“观音送子”、“天降麟儿”、“天仙送子”、“麒麟送子”、“瓜瓞绵绵”、“多子多福”、“多子多孙”、“五男二女”、“长宜子孙”、“儿孙满堂”、“五世同堂”（图22）等，表达人们祈望子孙兴旺、渴求多子多福的强烈愿望。

六是祝愿吉祥如意的吉语钱。

追求吉祥如意也是福文化的重

要内容之一。吉祥，预示好运之征兆，祥瑞，吉利，幸运等。《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成玄英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徵。”如意，原是旧时民间用以搔痒的工具，流行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大约出现于战国之时，又称“搔杖”，俗叫“不求人”。后成为吉祥之物，寓意万事顺利，吉祥称意。历代铸造了种类繁多的祝愿吉祥如意的吉语钱，如“必定如意”、“万事如意”（图23）、“百事顺遂”、“称心如意”、“事事称心”、“日月遂心”、“千万称心”、“诸事和合”、“吉祥如意”（图24）等，皆表达了人们间良好的祝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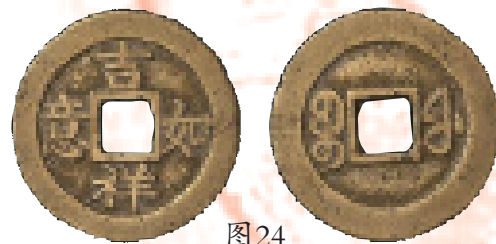


图24

吉祥纹饰祈幸福

古往今来，人们总是向往风调雨顺的生活，追求长长久久的幸福。人们对幸福的渴望，不仅挂在了口头、见诸于文字，还将很多美好的祈盼描绘成图形纹样，以借喻、谐音、比拟、双关、象征等手法来表达自己对幸福美满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就是福文化吉祥图

案。福文化吉祥图案追求“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人生仪礼和喜庆节日，成为传统吉祥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这些福文化吉祥图案，在历代钱币上也常常可以见到，其中以蝙蝠、莲鱼、瓜瓞、蝴蝶、乌龟、仙鹤、鹿、牡丹、寿桃、梅花等图案较为常见。



图25



图26

蝙蝠图案 这是历代钱币上最为常见的福文化吉祥图案。蝙蝠是唯一一类具有飞翔能力的哺乳动物，蝙蝠的真实形象是很猥琐丑陋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蝠”与“福”同音，蝙蝠成为了好运和幸福的象征。人们以蝙蝠表示福气、福禄寿喜等祥瑞。中国传统文化中，蝙蝠作为民间喜闻乐见

的吉祥符号，其表现图案都是非常美观的。以蝙蝠来祈福，是谐音福文化的典范。因此在钱币上人们往往用五只蝙蝠组成的图案来表示“五福临门”的祝福。例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信义储蓄银行发行的当十铜元100枚钱票背面就绘制有“五只蝙蝠”图案（图25），民国时期江西修水县“乾昌祥”商号发行的一千文钱票以及民国十三年（1924年）湖北陨县将军河陈家庄“万丰祯”商号壹串文钱票上也都绘制有“五只蝙蝠图”，代表所有吉祥的祝福。蝙蝠还可以和许多事物组合造型，构成寓意吉祥的图案。例如，由五只蝙蝠与寿元素（“寿”字或寿桃图案）组成的“五福拱寿”图案，也是一种最常见、最受欢迎的福文化吉祥纹样。中国人民银行于2015年1月发行2015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1/4盎司圆形金质纪念币、1盎司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寿桃和五只蝙蝠造型组合，共同构成了一幅繁缛富丽的吉祥画卷，寓意“五福拱寿”，象征着多福多寿。而且钱币背面上部的两只蝙蝠图案是倒着画的，深切表达出“福到”的良好祝愿（图26）。有一种钱币，在穿孔四周铸上四只蝙蝠图案，以蝙蝠与钱币穿孔的组合造型，寓意福到眼前、世世幸福（图27）。还有一种“五铢”钱币，在

钱币外廓上铸有一只蝙蝠图案，也寓意“福在眼前”，祝愿幸福的生活就要到来（图28）。蝙蝠还经常与桃子、石榴组合在一起，表达“福寿多子”的祝福。很多蝙蝠和桃的纹图，寓意“多福多寿”。蝙蝠、桃和两枚古钱的纹图，象征“福寿双全”等。

龟鹤鹿图案 这是象征长寿太平的传统福文化吉祥图案。龟是四灵之一，为甲虫之长，是长寿的象征，可兆吉凶。《龟经》载：龟一千二百岁，可卜天地终结。鹤是一种仙禽，为鸟中长寿的代表。《崔豹古今注》载：鹤千年则变成苍，又两千岁则变黑，所谓玄鹤也。在古代，鹿也被认为是神灵之物，它能给人们带来吉祥和长寿，神话传说中那些长寿的仙人就是骑着梅花鹿。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常用龟、鹤、鹿图案来象征长寿太平。存世有一种民俗钱币，正面为“龟鹤齐寿”四汉字，背面穿上有一只展翅高飞的仙鹤，穿下有一只缓慢攀爬的乌龟图案，以长生不老的龟鹤图案来表达长寿的祝福（图29）。还有一种圆形圆孔钱，正面为“金玉满堂长命富贵”字样，背面穿右铸一梅花鹿，穿左铸一仙鹤，上为桐树，下有花草图案，组成一幅“鹿鹤同春”的吉祥画，以“鹿”取“陆（六）”之音，“鹤”取“合”之音，谐音“六合”

同春“，象征天下太平，万物皆春，欣欣向荣（图30）。



图27



图29



图28



图30



图31

莲鱼图案 这是象征生活富足、多子多福的传统福文化吉祥图案。鱼和莲花是是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中最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标志性符号。鱼，自古以来为我国百姓所喜爱，除了它的食用价值外，其文化寓意也很丰富。鱼多子，与“裕”谐音，又与“余”谐音，是有多余富裕、子孙繁盛的象征。人们用鲤鱼祝福“年年有余，事事康宁”由来已久，可谓上至皇室贵胄、下至寻常百姓，皆视其为祥瑞祈福之物。在中国民俗文化中，莲



图32



图33



花也具有特殊的吉祥寓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有洁身自好的美好寓意，也象征纯洁的爱情，且莲蓬多子，又被视作是多子多福之意。莲与“连”谐音。因此，传统民俗文化中常用莲花或莲藕和鲤鱼的组合造型，即“莲蓬有鱼”图案，以象征物的谐音寓意“连连有余”、“年年有余”，期望连年都有富余的财富及食粮，生活永远美好富足，成为中国传统吉祥祈福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脍炙人口的吉祥符号之一。存世有一种双面镂空的花钱，钱币上有两条鲤鱼和莲花、莲叶图案，形象生动，表达出“年年有余”的祝福（图31）。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2015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1/4盎司圆形金质纪念币、1盎司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鲤鱼、莲花组合造型（图32），两者一动一静相互映衬，寓意“连连有余”，期望

生活永远美好富足；币面底部是朵朵翻腾的浪花，也是传统吉祥纹饰，寓意“福寿绵延，国家昌盛”。币图生动有趣，洋溢着对幸福生活的热爱、向往之情。

瓜瓞（蝶）图案 在中国民俗文化中，“瓜瓞绵绵”是象征子孙兴旺的福文化吉祥图案。“瓜瓞绵绵”来源于《诗经·大雅·文王之什》之《绵》篇。此诗开头便说：“绵绵瓜瓞，民之初生”。“瓞”（音：dié），就是小瓜；“瓜”，是大瓜。“瓜瓞绵绵”的含义是瓜始生时小，但其蔓不绝，会逐渐长大，绵延滋生，引申为生生不息，用为祝颂子孙繁昌，发达兴旺。传统的“瓜瓞绵绵”吉祥图案有三种构图方式，一种是“瓜”（大瓜）和“瓞”（小瓜），连着藤蔓枝叶和花；第二种是大瓜、藤蔓枝叶加上蝴蝶、金龟、蜻蜓等昆虫图案，以蝴蝶为最多见，取蝶与“瓞”同音，没有出现“瓞”图。第三种则是“瓜”、“瓞”、蝴蝶图案同时出现。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2015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1/4盎司圆形金质纪念币、1盎司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以瓜果、藤蔓以及蝴蝶造型组合设计，并刊“瓜瓞绵绵”字样及面额，构图饱满和谐，充分体现了绵延不绝、繁昌兴盛的吉祥寓意（图33）。

牡丹花图案 牡丹花也是常见



的福文化吉祥图案。牡丹花是中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和1500多年的人工栽培历史。牡丹花大而香，色泽艳丽，玉笑珠香，富丽堂皇，素有“国色天香”之美誉，被推戴为“花中之王”。唐代刘禹锡有诗曰：“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清朝末年，牡丹就已成为当时中国的国花。1985年5月牡丹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一。自唐代以来，牡丹就颇受世人喜爱，被视为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宋时更被称为“富贵之花”。牡丹花以其吉祥的寓意深受人们喜爱，成为传统的福文化吉祥装饰纹样，被广泛使用。牡丹图案在古代民俗钱币上可以找到，在当今人民币上更是大量出现。1957年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10元券，背面即以姹紫嫣红的多色牡丹纹饰作为主景装饰图案（图34）。第三套人民币2角券、第四套人民币10元券的背面，第五套人民币100元券正面“壹佰圆”面值下的装饰纹饰，均为牡丹图案。1992年开始发行的1元流通硬币，其背面也以一朵盛放的牡丹花作为主题图案（图35）。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10元流通纪念币、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流通纪念币以及1990年世界杯足球赛银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纪

念银币、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金银纪念币等，也选用了牡丹花作为币面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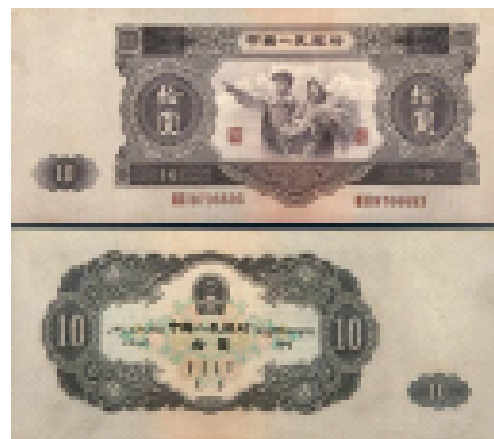


图34



图35

此外，福神、天官赐福、荷花、莲叶、寿星、寿字纹、梅花（花开五瓣，象征“五福”）、石榴、西瓜、佛手瓜、桃子、葫芦、葡萄、祥云、八吉祥、缠枝纹等图案、纹饰，也以“谐音寓意”或“以物寓意”的手法来隐喻祝颂吉祥幸福的主题，因此也成为历代铸行的钱币上常常出现的吉祥祈福图案。

独特钱型寓福意

圆形方孔钱是我国封建社会流通货币的基本形制。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秦始皇下令废除六国

货币，将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作为全国通行行使的通货，从此圆形方孔钱作为流通货币的基本形制被固定下来，并连续行用了2000多年。直到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天津、四川等地还铸造发行圆形方孔的“民国通宝”、“大汉纪元”钱。因此历代铸行的具有福文化内涵的钱币，其形制也绝大多数为圆形方孔状，但还有一部分造型较为独特的钱币，被称为“异形钱”，如葫芦、寿桃、连体、长命锁、梅花、鱼、钱树、钱剑等，以其生动形象的钱币造型表达吉祥幸福的祈盼。

葫芦形钱币 在中华民俗文化中，葫芦是重要的吉祥象征物，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寓意丰富。葫芦为藤本植物，藤蔓绵延，适应性强、长势好、果实圆润饱满，往往令人联想到家族的兴旺、繁衍与美满，因此人们把葫芦看作可以驱灾辟邪、祈求幸福，实现家族人丁兴旺、世世荣昌的吉祥植物。取其“蔓”与“万”谐音，寓意万代绵长。葫芦，谐音“福禄”。其枝茎称为“蔓”，“蔓”与“万”谐音，“蔓带”与“万代”谐音。葫芦与它的枝茎一起，谐音“福禄万代”，象征“福禄寿”齐全，万代绵长。葫芦既可食，又可为器。作器皿既能容纳、包藏，并且不拒固体、液体，又便携带，贮存，上古时期即视之为吉器，象征天生品质

以及被重视、重用，又寓意顺利、富裕、如意。所以，古代一些民俗钱币就特意铸造成葫芦形状，以取其吉祥寓意。图36就是一枚葫芦形状的古代理俗钱币，高67.5毫米，币正面有“龙凤成祥”及道教符咒，背面为八卦图案及干支文字，以形象生动的吉祥葫芦造型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图36

寿桃形钱币 在古代人的文化观念中，桃蕴含着吉祥如意、辟邪逐鬼、祈福祝寿的文化意义。早在先秦时期，桃就被当作镇邪驱恶的神物，当时人们已有用桃枝拒鬼于门外的习俗。如《庄子》中有：“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汉代以后又发展为在门前悬挂桃符阻止鬼怪进入住宅，“桃符”也被认为是春联的前身。桃还是长寿的象征，其形象以蟠桃、寿桃居多，这与古代神话传说有关，如西王母种植蟠桃、开蟠桃盛会等。传说中有一种仙桃，食之可延年益寿。相传孙臆为母祝寿，吃了师傅鬼谷子赠送的仙桃，返老还



童。后世人争相效仿，在父母生日时送鲜桃祝寿，誉为寿桃。后因桃子生长的季节性限制，人们又用面粉蒸成寿桃形状祝寿并流传至今。寿桃的寓意是祝福长辈福寿如意，因此桃子从众多瓜果中脱颖而出，在民间传说中被看作是长生不老的仙果，成为象征长寿的代名词，最终演化为福文化的重要符号。存世有不少铸成寿桃形状的民俗钱币。不过寿桃形钱币，寿桃一般是倒置的，为了便于悬挂，桃果朝下，桃柄朝上。如图37就是一枚倒置的寿桃形状钱币，正背面皆铸“长命百岁”四字，其祝福长寿吉祥的主题鲜明突出。

连体钱币 指铸成两枚横列叠压形状的钱币，目前所见最早的连体钱出现于汉代，但以清代连体钱较为多见，特别是道光、同治、光绪年号连体钱最为常见。钱古称“泉”，而“泉”与“全”同音同声，因此连体钱寓意“双全”。有一种清代晚期连体钱，正面“光绪通宝”背“福寿”字样（图38），就以“福寿”的吉祥文字和连体双钱的独特造型，表达出“福寿双全”之寓意，深受欢迎。还有一种清代连体花钱，正面为“道光通宝”，背为“天下太平”字样（图39、40），以连体“天下太平”的造型，强烈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期盼太平、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和理想。



图37



图38



图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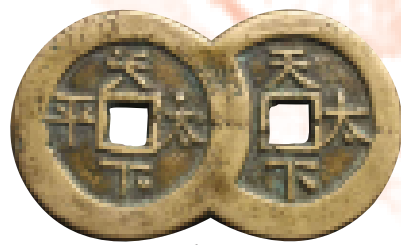


图40

锁形钱币 以锁寓意吉祥来源于古代佩戴长命锁的习俗。长命锁也叫“寄名锁”。佩戴长命锁的习俗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当时称为“长命缕”、“长生缕”、“续命

缕”等。古人们认为，锁是一种起封闭作用的器具，门、箱等一旦上锁，就只有用钥匙才能打开，所以锁也可用来锁住无形的事物。只要佩戴上锁形饰物，就能“锁”住生命，辟灾去邪。古人认为小孩一旦戴上了锁，就能避免病魔疫鬼侵入，无灾无祸，平安长大。所以人们把这种锁称作长命锁。古时新生儿满百日或周岁举行的仪式中最为流行的就是挂长命锁了。因此历代也铸造了不少长命锁形状的钱币，币面铸刻有“长命百岁”、“长命富贵”、“福如东海”等字样，用以辟邪去灾，祈求平安。图41就是一枚明清时期铸造的民俗钱币，黄铜材质，呈长命锁形状，上镌有“长命百岁”等文字图案，表达了长辈对晚辈的深切祝福。

梅花形钱币 梅花是中国传统名花，通常在冬春季节开放，与兰花、竹子、菊花一起列为“花中四君子”，也与松树、竹子并称为“岁寒三友”。在严寒中，梅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因此民间常以梅花作为传春报喜的吉祥象征。梅花花瓣五片，有白、红、粉红等多种颜色，象征着快乐、幸福、长寿、顺利、和平的“五福”，故又名“五福花”。历代铸造的民俗钱币有呈梅花形状的，多取其五福的吉祥寓意。图42就是一枚呈五瓣梅花形状的古钱，青铜材质，在梅花的五瓣中各铸一个汉字，连读为“长命守富贵”，传递出对长寿富贵生活的渴望和祝福。

中国人民银行也铸造发行了多套梅花形状的贵金属纪念币，如1993年开始发行的两轮生肖金银纪念币，每年都有出现梅花形状的生肖纪念币（图43），寓意吉祥，深受喜爱。

此外，历代还铸造了蝴蝶、鱼、古代钱币（布币、刀币）、钱树、钱剑等独特形状的异形钱币，以其形象的造型、象征的手法来表达吉祥幸福的美好祝福。

福文化是中国民俗吉祥文化的主要内容，而钱币是承载表现福文化的重要载体，钱币上的福文化可谓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异彩纷呈。历代铸造发行的蕴含福文化内涵的钱币种类繁多，表现方式多样，深刻表达出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吉祥幸福的祈盼，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关注生命、向往美满生活、追求实现自身价值的人生百态，值得我们收藏玩味。



图41



图42



图43

注：本文附图来自网络，谨向收藏者及作者致谢！

（作者：叶伟奇 福建省福州市中山路23号16座101室）

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 军用流通债券

书香人家

东北地广物博，对于资源贫乏的日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促使日本政府不惜采用种种手段对东北地区进行侵略和掠夺。

据统计，“九一八”事变前，从中日双方在东北地区的兵力对比来看，中国军队占有明显优势。东北军总人数约30万人。除了进驻关内的部队外，东北的军队还有26万多人：其中沈阳北大营8万人，东山口4万人，辽阳郑家屯3万人，锦州2万人，吉林及黑龙江两省约各5万人，总计在东北的正规军达27万人之谱。而日本关东军正规部队只有1.04万人，在乡军人约1万人，警察约3000人，共计约2.34万人，中国军队兵力8倍于敌。”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序幕。由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策划，日军关东部队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8日炸毁了南满铁路在沈阳柳条湖附近的路段，原计划挑衅中国军队，但中国军队并没有动作，日本便诬陷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进军入东三省。日

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当时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写道：

“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及历次对中国军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利取胜……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制，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矣。”

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初期以旧军队为基础的自发抗日武装力量，有民众自卫军、民众抗日救国军、自卫义勇军、国民救国军等，遍及东北三省的102个县，人数达50余万之众，统称之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活动地区几遍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各地。著名领导人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东北义勇军的兴起，有力地

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并且及时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伪造民意、树立伪满傀儡政权的阴谋。

东北抗日义勇军所处的环境十分恶劣，在长期的抗日战争中，义勇军多凭长枪、大刀与日军肉搏。在生活上义勇军弹少、衣单、粮缺，百姓真正成了饥寒交迫的奴隶。当时出现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一类组织，他们广募义款，充作械弹之需。甚至在海外的南洋华侨也汇来大批款项并筹措粮食。还有捐出自己的财产者，如张学良少将，虽服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指示，但私下则捐出大笔钱财，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运动。他曾以救国会名义，发出很多枪械、弹药、被服和现款给义勇军，也曾利用发行爱国奖券等方式给救国会以种种协助。

东北义勇军为解决活动的需要，迫切的军需和地方货币的流通，1933年开始自行印发过军票或军用券。有些军票是为了扰乱满洲国财政，此外还发行了很多兑换券。笔者收藏了一张“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这些票券虽然大都没有实际的担保，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兑现纸钞，但凭着地方民众出自爱国热情的支持和拥护，故币值十分稳定。

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

正面上方：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编号：5883106；右边：此券以东三省官银号各县农商贷款为基金；左边：民众联合救国会兑换每圆作奉天大洋伍拾圆；中间“城门楼”图案；两边面值：贰拾圆；两枚小印章：一枚是：救国会章，一枚是：党务委员下面：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印；最下面：财政厅印刷局印。背面是：一个蓝色大方印章，内容是：诸葛亮的出师表左下角是：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壁。这枚纸币属地方债券，对研究旧中国特别是东三省的货币债券是抗币的珍品，有很大的价值。

据资料载：“当年中国主要有上海、奉天、天津三个官办的造币厂。上海和奉天造币厂印制的纸币，用红色字体印刷编号，天津造币厂印制的纸币，用绿色字体印刷编号。该纸币是用红色字体印刷编号的，1933年时，奉天已经沦陷，不可能为义勇军印纸币，所以只能是上海造币厂印制的。”

该纸币的背面用细小的字体印制了诸葛亮《前出师表》的六百零一个字（原文633字），使用这样的防伪技术即便是在今天也是高成本的。

据《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一



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

书载：“在张学良的倡导和支持下，1932年11月中旬，救国会和后援会达成协议。成立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辽吉黑热后援会会长朱庆澜任总司令。后援会专主募集资金，支援义勇军的工作。救国会协助朱庆澜专主指挥义勇军对日作战事宜。”

根据这张1933年由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发行的军用流通债券的实物佐证，1932年11月中旬，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上海的辽吉黑热后援会在北平达成的协议是联合协议，救国会和后援会联合成立了一个名为“东三省民众

联合救国会”的组织。在这个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朱庆澜出任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的会长兼抗日义勇军总司令。这个组织发行的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以东三省官银号各农商贷款为基础，每元可兑换奉大洋五十元。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以军用流通债券的形式发行流通货币，向东北抗日义勇军提供经费。

（作者：贵州省钱币学会常务理事，原贵阳市云岩二中退休干部）

中国钱币学会2015年工作总结

2015年中国钱币学会在行领导和第七届理事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届全会精神，根据《中国钱币学会章程》的要求，坚持“服务社会、服务金融、服务会员”的学会宗旨，团结和组织广大会员，按照“保护、弘扬、传承、普及”的工作要求，强化法律法规意识，规范学会组织建设，积极发挥学会桥梁纽带作用，认真推动钱币学术研究、宣传普及与文化交流,较好地完成了全年工作任务。

一、以学术为中心，钱币研究取得新成果

学术研究是中国钱币学会的立会之本，2015年在继续推进《中国钱币大辞典》和《中国历代货币大系》等重点项目的同时，围绕实施《中国钱币学会学术课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开展货币史、金融史专题研究，面向社会组织课题申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年度课题管理

为促进我国钱币学研究向专业化、学术化、科学化方向发展，提升钱币学与货币史的学术影响力，中国钱币学会2013年正式实施《管

理办法》以来，积极推动钱币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2015年通过广泛征集、专家论证的方式制订了年度课题指南印发各单位会员，并通过中国钱币博物馆网站面向社会进行招标。2015年共收到37个课题申报项目，最终17项课题通过审核立项，其中专著8部，论文7篇，调研报告2篇。同时，推进2014年度14个已立项课题的结项审核、验收工作。

（二）重点项目

一是推进编撰工作进度。《中国钱币大辞典》和《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是由中国钱币学会支持的重要研究项目，自20世纪80年代初立项，至今已三十余年，是反映我国当今钱币学与货币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工具书，在中国钱币学界具有重大影响。多年来分别由河南省钱币学会、上海市钱币学会承担编撰任务。《中国钱币大辞典》共12编23卷，2015年年初《中国钱币大辞典》之《民国编·商业银行纸币卷》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清（代）编·金银币卷》完成初稿，并组织召开未出版6卷9本辞典编撰工作推进会。截止2015年底已出版12编19卷。另一重点项目《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全书共12卷，第12卷即最后一卷《钱币学与货币文化》已清稿



交付出版社。

二是《中国古代银铤铸造工艺研究》荣获“全国银行科技发展奖”一等奖。该课题是近年开展的一项专题研究，填补了钱币学、货币史及科技史领域的研究空白，为中国古代银铤真伪鉴定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

三是制作开通中国钱币博物馆（中国钱币学会）新网站，基本完成反假货币展数字博物馆二期项目制作，并成功申报“中国历代货币展示——基于三维实景虚拟空间的互联网数字博物馆”项目。

四是完成《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六辑稿件的选择和审编工作，论文集较全面反映了五年来国内钱币学、货币金融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钱币专题研讨

一是积极推动“钱币学”学科建设。中国钱币学会与河北师范大学进行深度合作，借助其已有的考古学、历史学学位授予点，招收钱币学、货币史研究方向的研究 生，实现钱币学正式走入高等院校的夙愿，目前河北师大已取得钱币学博士生培养权。

二是与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河

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联合召开“第三届中国金融史学术研讨会”。会议由河北师大承办，来自全国高校和各级钱币学会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这是中国钱币学会首次与高校合作，专门组织钱币学、货币史研究者与金融史、经济史专家一起研讨交流，互相借鉴启发，是一种钱币学、货币史研究交流的新形式，对切实推动钱币学、货币史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很有裨益。中国钱币学会将继续坚持这种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的金融史、经济史学者交流研讨机制，促进钱币学、货币史研究健康发展。

（四）省市级钱币学会开展学术研究

除中国钱币学会主抓的专题研究外，省市钱币学会也开展了具有特色的钱币研究，并取得新的成绩。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山西省、上海市、江苏省、山东省钱币学会着重对抗战时期的金融与货币开展学术研究；上海造币有限公司钱币研究会编辑出版了《国家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币章集》。为配合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新疆、甘肃省、宁波市、西安市等钱币学会组织开展丝绸之路货币学术交流和专题研讨会，探讨丝绸之路货币所蕴含的文化及艺术价值，从钱币文化的视

角揭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重要意义。福建省钱币学会近年组织开展台湾货币史研究，编辑出版了《台湾货币史略》，其个人会员出版了《漳州外来货币概述》、《清代驻厦领事国家钱币集萃》；山东、山西、江西省钱币学会则分别组织编辑出版了《北海银行货币大系》、《晋商史料集成》、《江西红色金融记忆》等极具地方特色的钱币研究成果。地市级钱币学会如宁波市钱币学会编辑出版了《宁波市钱币学会2014年论文集》，淄博市钱币学会编辑出版了《齐国三字刀百拓图集》。

二、加强钱币知识普及，弘扬钱币文化

（一）挖掘展览主题，推陈出新扩大影响

学会注重发挥学会会员、博物馆资源优势，突出文化特色，打造精品展览。

一是红色政权货币展。2015年红色金融历史展巡展进一步丰富了展览内容，扩大了展览规模，先后在遵义、武汉、长沙等地展出，共接待观众20余万人次，社会各界反响良好。这项活动带动了河南、河北、山西、江苏、江西、淄博、宁波、安庆等省市钱币学会开展革命根据地金融史料整理研究和银行遗址的抢救保护工

作，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二是与广东省江门市博物馆进行交流展，引进其特色展览“金山伯的荣耀——江门五邑侨汇展”，推出“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政权货币展”在江门市博物馆进行外展交流。“金山伯的荣耀——江门五邑侨汇展”共展出历史及文物图片400余幅，侨汇文物近百件，展现了江门五邑地区的特色侨汇文化、华侨爱国爱乡的精神，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壮大红色金融事业，抵御敌伪金融入侵，保护根据地人民财富，为抗战胜利打下坚实经济基础的历史。

三是“纪念中国银行卡发行三十周年展”。展览在2015年北京国际钱币博览会期间展出，中国人民银行范一飞副行长、相关司局领导以及各界人士参观了展览，3天展期共接待观众5000余人次。展览通过宣传我国银行卡的文化内涵和寓意，展示了我国金融事业的发展繁荣历程，进一步激发了爱国主义情怀。

四是在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金融展上举办“反假货币展”。该展对最新反假货币研究成果以展览的形式进行了宣传，引导公众了解我国的反假货币工作及其意义，全面认识假币现象及其历史渊源，普及提升反假货



币的知识和技能，提高防范意识。

（二）开拓新媒体渠道，扩大 会刊影响力

一是办好《中国钱币》杂志，提升学会影响力。自2013年《中国钱币》杂志由季刊升格为双月刊，增加了民间藏珍栏目，并对版面风格进行了较大的调整。继续坚持学术性与知识性并重的原则，严把学术质量关，展示新成果新观点，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同。鼓励有研究实力的省市学会继续办好学会会刊。

二是开拓网络媒体宣传渠道。利用微博、微信新媒体传播钱币学术研究动态，发布博物馆展览和学会活动信息，听取网上意见，扩大中国钱币博物馆、中国钱币学会的社会影响力。目前《中国钱币》杂志新浪微博粉丝达16000人，在同类微博中名列前茅，《中国钱币博物馆》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人数达到5000余人。

（三）举办专题讲座，拓宽研究视野

中国钱币学会组织开展专题业务讲座活动，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分别就中国古代银锭铸造工艺、银行发展历程、丝绸之路钱币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等主题作专题报告，拓宽了视野。省市学会也通过举办专题讲座，

普及钱币知识，传播钱币文化，增强学会凝聚力。如陕西省钱币学会针对大中专学生开展了陕西革命根据地货币发行史、中国近现代机制币等主题讲座，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三、为会员服务，提高学会凝聚力与活力

（一）开展“中国钱币学会专家库”建设工作

根据中国钱币学会专家入库标准、产生办法，2015年经过初审和秘书长办公会审议研究，确定了拟入库专家名单，目前92位专家填写了《中国钱币学会专家库入库专家信息简表》，正式成为中国钱币学会专家库成员。学会将对入库专家实行动态管理，不制发专家证书和公告，将根据专家特长推荐参与中国钱币学会相关活动，充分发挥学会的专业优势，服务社会、服务金融、服务会员，推动我国钱币事业的发展。

（二）推进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转发《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通知》以来，在各级钱币学会积极配合下，人行系统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进展顺利。中国钱币博物馆在第一阶段工作基础上，完成了纸币类藏品12万件的数据采集，上传14025件藏品的数据。福建、江

西、河南、新疆、甘肃、西安等省、市学会按照实施方案，进行本地可移动文物自查申报工作，已初步完成实物清查工作，目前已进入审核上报阶段。

（三）配合货币发行宣传工作

各学会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配合货币金银部门开展人民币宣传。

一是通过宣传日、讲座、免费咨询、义务鉴定、制作公益宣传片等方式，向群众传授人民币防伪知识、真假币鉴别方法、残损人民币的兑换标准等内容，提高公众识假、防假的能力。重庆市钱币学会参与反假公益片《进取人生篇》创作，更多学会开通微博、微信订阅号，扩大钱币知识普及受众面。

二是配合新版人民币发行做好宣传。河南、苏州、淄博、西安等省市钱币学会发挥学会组织纽带作用，宣传普及人民币一百元新钞的防伪特点，提高公众的反假货币意识和水平。

三是落实普通纪念币兑换管理要求。2015年重庆、福建、江西、河北、山东等省级钱币学会强化章程意识，加强学会组织建设规范化管理，结合实际发展新会员，对老会员进行重新登记，完善会员档案

资料，做好为会员兑换纪念币服务基础性工作。随着普通纪念币发行方式实行网上、柜台预约措施的出台，广西、北京、赣州、海南等学会通过网站、微博、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向会员转发人民银行普通纪念币发行公告、辖区预约兑换网点、发行数量、兑换时间等信息，引导会员适应纪念发行新方式，为会员收藏提供服务。

（四）支持基层钱币工作，引导民间钱币活动

一是中国钱币学会积极支持单位会员工作，指导山东、江苏、甘肃、福建、西藏、湖北、西安市、淄博市钱币学会完成了换届选举工作。组织各学会或个人报名参展、参加“2015北京国际钱币博览会”，为基层学会及广大会员和钱币爱好者提供学习交流机会，并做好联络服务工作。派员参加济南第十二届中国铜元研讨会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钱币学会举办的首届大中华钱币收藏研讨会，支持、引导民间收藏交流活动。2015年福建省钱币学会被评为标准化学会和4A级社会团体，河南、上海、宁波等省市钱币学会被评为当地社会科学先进单位。

二是鼓励开展丰富多彩的会员活动，力争创建会员活动品牌。福建、吉林、河北、贵州、





广西、山东、北京、上海、苏州、南充、桂林等省市钱币学会长年坚持定期举办会员活动，开展钱币知识专题讲座，在收藏品市场设立钱币咨询服务点，免费为公众介绍钱币知识，义务鉴定；上海市钱币学会的钱币收藏品义务鉴定被评为上海市社会科学学会特色活动奖；新疆获批为自治区社科普及教育基地，山东被评为全国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

四、积极开展中外联系与交流 活动

加强与国外钱币界的联络，增进国内外钱币研究新成果的交流，宣传我国钱币文化学术研究成就。

一是接待国务院马凯副总理和法国财长萨班先生参观中国钱币博物馆。9月，时值第三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之际，国务院马凯副总理陪同法国财长萨班专门参观了中国钱币博物馆。马凯副总理详细询问了中国钱币博物馆有关业务工作开展的情况，肯定了博物馆的相关工作，表达了对钱币研究、宣传钱币文化事业的关注和重视。萨班先生是中国古钱币爱好者，他饶有兴趣地参观了钱币博物馆的“反假货币展”、“中国古代钱币陈列”和“中国近现代钱币陈列”，并与钱币博物馆专家交谈了有

关中国古代钱币方面的研究心得。萨班在参观结束时欣然为中国钱币博物馆题词，其中一句“向伟大的文明致敬！”，表达了他对此次参观的满意和对我国灿烂而独特的古代钱币文化的敬意。

二是接待国际艺术纪念章联合会主席参观中国钱币博物馆。11月8日，国际艺术纪念章联合会（FIDEM）主席菲利普·阿特伍德先生专程从伦敦来京出席中国钱币学会分支机构币章艺术专业委员会揭牌暨网站开通仪式。会后，阿特伍德主席到中国钱币博物馆参观。

三是出席国际钱币学术会议。2015年9月，组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意大利古城陶尔米纳召开的第15届国际钱币学大会（INC）和国际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ICOMON）2015年会。中国钱币代表团通过此次国际会议，更多地了解了国际钱币学近年来的研究与发展概况，也感受到了钱币学在西方作为一级学科的地位和研究热情，同时，向国际钱币界传递了中国钱币学研究、发展的声音，对钱币学领域加强中外学者的联系和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加强学会组织建设，更好 发挥学会职能

（一）筹备组建中国钱币学会分支机构为了贯彻落实金琦理事长在2014年常务理事会上关于发挥钱币学会在专业领域的引领作用的讲话精神，根据《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取消全国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拟增设学会分支机构，以在钱币不同领域深耕细作，充分发挥社会与民间的力量，发展我国钱币事业。

（二）召开常务理事会

根据《中国钱币学会章程》，报经行领导同意，于2015年10月9日—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中国钱币学会2015年常务理事会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设立中国钱币学会币章艺术专业委员会、中国钱币学会金银货币专业委员会、中国钱币学会货币史专业委员会三个分支机构的提案以及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调整事宜，完善了学会组织架构，充实了学会领导力量。目前币章艺术专委会、金银货币专委会已挂牌成立，货币史专委会将择日挂牌成立。

（三）会费收缴管理工作

会费是中国钱币学会主要收入来源，收缴会费是学会日常工作之一。中国钱币学会2015年注重会费收缴过程的管理，通过邮件、短信、

电话等方式加强沟通，77家会员单位中57家会员单位按要求缴纳年度会费，其中10家会员单位补缴了往年会费。会费收入共计160.1万元，年度收缴率为74%。会费收缴情况反映了部分省级学会面临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需加以研究解决。

（四）落实制度，稳健开展学会工作

一是根据《关于开展中国钱币博物馆廉政风险防控检查的通知》要求，中国钱币学会对照廉政风险防控措施抓落实，并根据工作事项变化及日常工作中与风险防控方案不适应的内容，对“廉政风险防控指南”相关工作进行了修订完善。

二是根据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转发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整治社会组织乱摊派的实施方案》要求，开展自查自纠活动，并将自查情况报告金融研究所。

三是实施《中国钱币学会秘书处工作规则》，坚持学会工作例会制，注重学会资料文件档案收集整理。此外按照民政部对社团管理的有关要求，完成年检、免税资格审核，参加社团管理业务培训。



中国钱币学会2016年工作要点

中国钱币学会在新年度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大”以来的历次全会精神，以《中国钱币学会章程》为指导，切实履行钱币学会“服务社会、服务金融、服务会员”的宗旨，以钱币研究为重点，积极开展学术活动；以弘扬钱币文化为主线，努力普及钱币知识；积极为会员服务，不断提高学会凝聚力与活力；切实加强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进一步提高学会工作的整体水平。

一、积极开展钱币研究与学术交流，多出高质量学术成果

(一) 依据《中国钱币学会课题管理办法》，加强对重点研究课题的组织、管理及推动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国钱币学会课题管理办法》（中钱秘发[2012]12号），印发《中国钱币学会2016年度课题指南》，该课题指南由四个研究方向36个参考题目组成，基本涵盖了钱币学研究的主要方面。今年做好2014年、2015年立项课题的验收工作以及2016年重点学术课题的立项、评估工作，组织、推动好重点课题的研究。

（二）搭建交流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

1. 积极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加大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相关部门的合作力度，广泛动员有关专家学者参与开展专题学术研究活动，拓展学术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提升学术成果的质量。

2. 继续加强有关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的研究。今年拟在去年已有准备的基础上，与宁波钱币学会及宁波钱币博物馆合作，召开一次以“海上丝绸之路货币”为专题的研讨会。

3.在有关“钱币学”学科建设调研以及去年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召开货币史专题研讨会的基础上，今年继续加强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高校合作，以联合开设选修课或讲座、组织有关专家授课等方式，切实加强“钱币学”学科建设。

4.组织好学会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工作。继续采取切实措施,保证编写经费和人员投入,在提高编辑

质量的同时，加快出版进度。《中国钱币大辞典》今明两年计划完成《民国编·商业银行纸币卷》以及《清(代)编·纸币卷》两部；《中国历代货币大系》计划完成最后一卷《钱币学与货币文化卷》的出版工作；《中国钱币丛书》计划完成有关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同时，继续推进其它钱币学术专著的编辑出版工作。

5.做好会刊《中国钱币》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结合钱币学研究实际，坚持学术性和知识性相结合的原则，努力提高办刊质量。充分发挥杂志网站的沟通平台作用，完善投稿、约稿和审稿制度，提升稿件质量。紧跟学术界、收藏界动态以及会员需求，适当增加收藏热点文章，提高杂志的可读性，注意吸纳读者的反馈意见及建议。

二、做好钱币知识的宣传普及，弘扬钱币文化

(一) 宣传反假货币知识。积极配合人民银行做好反假货币的宣传与研究工作,继续与有关部门合作,开展货币防伪与反假方面的学术研讨及宣传普及工作。

（二）举办专题展览，宣传

普及钱币文化。充分发挥各地钱币博物馆（陈列室）、会员及钱币爱好者的作用，积极举办有关的专题钱币展览和会员精品收藏展，努力向社会宣传金融法律法规，普及钱币文化知识，继续做好为基层学会及广大会员和钱币爱好者的联络服务工作。

(三) 积极抢救和发掘红色政权货币金融史料，撰写红色金融论文，编辑红色金融史料集，条件成熟时可以筹划拍摄记录片、宣传片或电视剧，以多种形式揭示宣传红色金融历史，弘扬红色金融对新中国创立的贡献。

（四）发挥钱币学会专家在历史文化领域的特长，为中国各类纪念币的选题和设计贡献智慧，打造出富有文化内涵、契合时代精神的纪念币产品。

(五) 办好互联网网站，发挥中国钱币博物馆网站以及各省市钱币学会所办钱币网站的作用，及时报道国内外钱币界的有关活动。

(六) 顺应移动媒体和自媒体时代的潮流，积极建设和完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迅速而有效地传播钱币信息，普及钱币知识，弘扬钱币文化。



三、积极为会员服务， 提高学会凝聚力与活力

（一）充分调研钱币的评级鉴定工作，适时制订发布中国近代机制币评级标准。

（二）在去年牵线、协调博物馆陈列部与湖北钱币学会合作，联合举办“湖北近代钱币展”的基础上，今年联系、推动学会单位会员、个人会员与中国钱币博物馆联合举办展览。

（三）积极开展业务培训并举办专题讲座活动。业务培训是学会服务会员，普及钱币文化知识的重要方式。根据广大会员及钱币收藏爱好者的要求，计划在以往举办的各级学会秘书长培训班的基础上，和有关培训机构合作，增加对广大会员及钱币收藏爱好者的培训。同时，邀请有关专家学者举办专题讲座，加大对钱币文化、金融知识的宣传普及力度。

四、积极开展对外联系与学术交流

加强与国外钱币学界的联系，借鉴欧美钱币学成熟的学科体系建设和钱币学术研究方法及成果，推进中国钱币学科建设和

钱币学术研究的科学化。与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一起组织中国钱币代表团参加国际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2016年会。

五、加强学会自身组织建设和 制度建设，更好发挥学会职能作用

（一）拟召开中国钱币学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进行换届改选。

（二）印发《中国钱币学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加强已经设立的三个分支机构即币章艺术专业委员会、货币史专业委员会、金银货币专业委员会的规范管理。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开展学会工作，根据民政部的有关规定及《中国钱币学会章程》，继续酝酿筹建有关的专业委员会，不断完善中国钱币学会的分支机构。

（三）加强对各单位会员工作的指导。按照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有关社团管理要求以及《中国钱币学会章程》的规定，指导各单位会员坚持依法办会，严格按照学会章程有关要求开展学会活动，开展对中国钱币学会省级团体会员组织建设工作情况的调研。拟举办一期学会秘书长培训班。